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罗森(Stanley Rosen) ● 著

柏拉图的《治邦者》

——政治之网

Plato's Statesman
The Web of Politics

陈志伟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柏拉图的《治邦者》 新神话学讲稿

[美]罗森 著 陈志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的《治邦者》——政治之网/(美)罗森著;陈志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17-7141-9

I. 柏… II. ①罗…②陈…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②政治家—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7680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PLATO'S STATESMAN: THE WEB OF POLITICS

By Stanley Rose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1995 by Yale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censed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008 号

柏拉图注疏集

柏拉图的《治邦者》——政治之网

(美)罗森 著

陈志伟 译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41-9/B·501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之一，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可是，到了18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40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

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5年元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设置场景 / 7

第二章 划分法 / 24

第三章 颠倒宇宙的神话 / 56

第四章 修正划分法 / 98

第五章 范例 / 117

第六章 编织 / 141

第七章 度量 / 170

第八章 法律 / 198

第九章 城邦作为影像 / 239

书目附录 / 270

索引 / 278

前 言

[vii]我希望面前的这本书不仅能够吸引那些柏拉图专家，还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哲学公众来阅读她。尽管本书是独立著作，但亦可将其作为我对《智术师》研究^①的继续，并也可以把她延伸为在《存在问题》里对柏拉图主义讨论的增补。《治邦者》的中心主题是实践智慧(phronēsis)或称为良好判断(sound judgment)与技艺(technē)之间的关系问题。试图确定政治经验是否服从于分析的准形式方法(quasi-formal methods of analysis)并为这种方法所澄清，这种努力打开了通向未来的一条模糊的道路，至今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并且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近代科学启蒙是此条道路的一个紧要关头，例如，孔多塞将笛卡尔主义的数学普遍性推广到对人类事务的概念控制，正说明了这

① 斯坦利·罗森在1983年出版的另一部柏拉图研究著作：《柏拉图的〈智术师〉：原型与影像的戏剧》(Plato's Sphist: The Drama Of Original And Im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本书中，罗森自始至终没有使用一个随文脚注，其原因如其在下文中所述(见下页)。但由于知识背景、相关解释性文字以及一些特定词汇的翻译公案，译者将不得不随文酌加必要的脚注，以帮助中文读者甚至译者自己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义理以及柏拉图的学说。故全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添加，以后不再注明。

一点。在这条路上,我们面临着持久的拷问:人类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构造,或如今人所言,我们普通的历史经验是否仅仅是一个神话——一种被给予的神话——并因此只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不应希望将这些柏拉图讨论的问题置于现代概念术语里,或用现代革命性修辞特有的直截了当来解释。同时,如果我们愿意使自己顺从柏拉图修辞的细心照管,并将我们从当前意识形态论争所想象的柏拉图主义中解脱出来,有益的惊喜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要是考虑到按照当代标准对今天所谓的哲学方法论的反思来看,《治邦者》能够并且应该被细致理解。据此,我将尽力保留划分法、范例和度量的两种方法——数学的和非数学的,这种区分可与帕斯卡尔提到的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相提并论——等相关主题讨论的充足空间。这些主题是异乡人技术论证的关键。正如这篇对话的题目所示,方法论问题[viii]与政治术紧密相关。这个问题并非单纯地回答了什么构成政治知识分析的恰切方法,它进一步延伸至:在人类经验中,技艺的运用不仅仅是发现,而且是一种制作活动。通过考察异乡人教诲里的结构元素,我们可以前进到更深的问题之中,即苏格拉底和爱利亚异乡人之间的关系。异乡人将技艺运用到定义政治的任务中,通过政治这种技艺,人类制作出人工制品,特别是城邦这样的人造物,以保护自己,抗衡敌对的自然。由此,对《治邦者》的细致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描述,会比一般展示的柏拉图复杂教诲更深刻、更丰富。通常,柏拉图一方面被批评为乌托邦思想家,另一方面又被批判为保守主义的代言人。我怀疑这两项指控能否并行不悖。哲学按其本性是革命活动,而保守主义至多是一种策略。《治邦者》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哲学统治的可能性,或者用异乡人的术语说,不受法律妨碍的实践智慧统治的可能性。异乡人最终认为那样的统治不可能,这个结论与

我们对《王制》的理解不无关联。因此,他对政治结构的论述以及由此得到的结论,既是虔敬的又是传统的。但是,由于人类从自然统治中获得的部分解放,这种结果令人不满。异乡人仅仅在防御性的概念上来理解政治,而防御的敌人就是自然,或更准确地说,是友好的和敌对的自然在人类内部的分裂。对实践与制作之间明显区别的忽略,在理论或在(如《治邦者》中所称的)认知(gnosis)上投下了阴影。政治的一个例子,指挥术(The art of commanding)被异乡人规定成,为了产生先前并不存在的物体的活动。因此,无论在认知中如何划分种类,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一门实用或制作的理论。另外,划分法,理论家的主要工具,也被异乡人从苏格拉底的相论中不露声色地剥离出来,应用于对人类事务的分析,由此混淆了发现与形式因素的构造之间的差别。划分法介入了概念构造。除了异乡人与苏格拉底之间达成的许多共识,以及这篇对话传统的“柏拉图式”结尾,《治邦者》给我们展现了关于理论与实践这一现代问题的惊人预见。无疑,柏拉图对问题的解决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但是与亚里士多德相比,[ix]在思想和精神上,柏拉图离现代人尤其是当代情境更近得多。上面提到的自然的友好与敌对两个维度之间的分裂,构成了人类生活戏剧特征的基础,我们对这种分裂的弥合努力既可被看作悲剧,又可被看作喜剧,但当然不能被当作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论人类事务时所标示的“愉悦”(heiterkeit)。亚里士多德和爱利亚异乡人之间的基本不同可能在于以下方面: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实践智慧(phronēsis)是一个表述实践与制作之间差异的词,人类事务受实践智慧的支配,既不需要工匠也无需哲人提供中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节制是哲学愉悦的政治面孔。与此相反,爱利亚异乡人给我们展示了柏拉图式的疯狂,他认为,实践智慧仅在其是全能的条件下方才能够统治;但由于这不可能,

实践智慧必须屈服于法律，并因此屈服于治邦者的制作术，后者将理论家和制作性工匠联合在一起。这是异乡人对苏格拉底乞灵于哲人一王的修正。这就是要求具备忍耐力的哲学动机，以控制异乡人的独特修辞。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沉浸在文本细节之中，由此带领读者直接进入《治邦者》的哲学视野，行文过程中，我避免使用传统的脚注，而用补充文字提示我的赞同和异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书目附录中查看相关学术著作的简短讨论。年龄大了的一个宽慰，就是可以不必过分卖弄学问。这又随之带来需要还债的义务。从施特劳斯主持的研讨课上他对《治邦者》的超凡引导开始，我研究《治邦者》有四十余年了。无论我的解释和施特劳斯有多么不同，此时，尤其是在施特劳斯的著作被他的众多批评者不带一丝感恩地偷偷挪用，甚至在他们已经对施特劳斯欠债却仍明确否认之时，我想向施特劳斯表达敬意，是他教会我如何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以及他以前的每一位学生，都无法精确无误地找到他首次就要求我们予以注意的无数细节。我对施特劳斯的感激，溢于言表。我说我感激施特劳斯，部分是出于我们之间的分歧——这乃是对伟大教师表达敬意之言。我不清楚施特劳斯是否在他的敌人或他的弟子手中遭受了更多痛苦。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在美国，主要是他开始了对《治邦者》的重要研究。我[x]构思此书，乃为与施特劳斯争辩（Auseinandersetzung），又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不愿费力加上参考书，无论这些书多有价值，它们在我对柏拉图的理解中都毫无作用。无论如何，学者之间的争论仅仅是学者们的兴趣，我宁愿将此书献与哲人。因此，我对哲学读者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以之为前言作结。“神隐于微处”，此格言可普遍运用于解读柏拉图，尤其是《治邦者》。那些宁愿对复杂文本的义疏进行简单讨论的读者，最好的情况是，他们会报怨我研究的

部分过于别出心裁,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会抱怨我的研究冗长乏味。有人会问,为何我们必须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把握柏拉图巴洛克式复杂的编织艺术,以及伴随着的制作、财物、仆从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答案就包含在随后的解读中,即柏拉图过分的别出心裁,随即化为他普遍教诲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对我们洞察柏拉图思想最激进方面的正当性的有趣检验。如果对于考察者来说,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这话还有点道理,那么与此相关的主张就更有道理,即一部柏拉图对话,尤其是像《治邦者》这样的后期对话,是对它的主要文本的一系列注脚,这些注脚改正、修复那个文本,并在有些时候与它相悖。我们活在自我标榜为反柏拉图主义,并以解释学的精巧而骄傲的时代。所有这些主张都不可能通过概括柏拉图文本片断的阅读而被证明合理,无论这些片断的内容多么具有戏剧性的表达,也无无论这些片段多么著名。我邀请那些愿意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相信他们自己是柏拉图主义者还是反柏拉图主义者,不去重复流行的陈词滥调,而是加入到我对《治邦者》整体而进行的困难重重的思考当中。

第一章 设置场景

[1]毫无疑问,柏拉图的后期对话比前期对话在内容上更难懂。苏格拉底的主要谈话者角色分别被从爱利亚、洛克里和雅典来的异乡人取代,这种替换伴随着语言上的日益冗长沉闷,技术细节上的漫延扩散,并逐渐递减了爱欲嬉戏及阿提卡文雅,而这些趣味和文雅是前期对话的标志性特征。一方面,最初的明朗和清晰的优势——即使发生在夜晚的对话如《会饮》和《王制》,尽管主要谈话者孜孜于反讽,仍然具有这种优势——被明暗相间和巴洛克式的修饰代替,另一方面,戏剧性的对话被学术讨论取代。

确实,在传统认为是后期对话的《斐勒布》中,苏格拉底重又处于显著突出的地位,但这仅仅是这个规律的一个例外而已。由于蒂迈欧和爱利亚异乡人而甘愿接受沉默的旁听者这样的惩罚,以及成为老年帕默尼德的回顾性的辩证法陪练者这样的角色,可见《斐勒布》中的苏格拉底就像他先前具体化形象的一个空洞的幻影。苏格拉底和匿名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发生在一个未知的戏剧场景里;它既没有一个开头,也没有一个结尾,仅仅是一部无头无绪的残缺不全的作品,里面充满了谈话方向上的

变幻莫测,话题的神秘转变和语言上的模棱两可。在他奥德修斯般无目的地漫游时遇到了似乎使他丧失言辞的异乡人之后,苏格拉底终于从隐喻性的地狱里转变到阳光般明朗之处,但是像一个谈论着的幽灵一样,这个幽灵将最终转变成雅典的陌生人^①形象(正如亚里士多德似乎证明的那样;参见《政治学》II,1256a10)。

《治邦者》虽然不是柏拉图的最后一部作品,却以其朦胧含糊的特点而明显应将其置于后期对话中。这篇谈话的大部分致[2]力于分析精细的、看似乏味的编织技艺,这种技艺被异乡人挑选出来作为政治学高贵技艺的范例。异乡人使用划分法——按照种类划分和集合的技艺——以达到对治邦者技艺的界定,但是这种界定带着令人厌烦的性质和倾向错误证明或者是笨拙的游戏,或者是技术上的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为他先前在《智术师》中的展示做好准备。

带着我们穿过一条漫长而又令人困惑的划分法道路,异乡人证明它是一个错误,为此他将讲述一个神话来纠正:通过一个宇宙革命逆转和土生凡人时代奇异神话传说,概念分析将会由羞耻中被拯救(268d2-3)。在异乡人自己的陈述里,这个神话证实在本质之点上犯了错误,应代之以一系列困难的,甚至还是古怪的论题,安排了从范例的自然本性,到度量技艺,再到编织的讨论以及工具,财物,与制衣联系在一起的工匠等相关分析。如果我们没有屈从于开端和错误累累的中间部分的停滞的话,我们会看到,通过一种修辞技巧,异乡人不知为何将他的复杂网

①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出现了“雅典异乡人”(Athenian Stranger)(《法义》中)和“爱利亚陌生人”(Eleatic Stranger)(《治邦者》中)两个陌生人,译者根据苏格拉底的雅典人身份,将《法义》中的 Stranger 译为“陌生人”,以表明其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同城而不识;而把《治邦者》中的同一词译作“异乡人”,以表明其与苏格拉底在公民身份上的不同,以及与他们谈话地点(雅典)的些许微妙关系。

络的丝线收集起来放进了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结论里去,这一结论在一开始就被建立起来了。

我们对《治邦者》之独特性的初步考察允许我们怀疑将此对话看作是一个对定义的技术性练习的解释的适当性,更加精确的做法是把这篇对话作为划分法在研究人类事务上的不恰当性的一个实证。从这一点出发来看,从苏格拉底到爱利亚异乡人的转换,具有比那些将之视为其思想中宣告进入新阶段的柏拉图道路,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可以预料,在很多基本观点上,异乡人明显地与苏格拉底相一致。例如,在结论性观点里,城邦必须由勇敢之人和节制之人这两种正相对立的自然编织起来,一方面,如果勇敢独行其道,必将以疯狂告终而遭毁灭之命运,另一方面,节制单行又会导致软弱无力而终成残疾(310d6—e3),这种后果在《王制》中也被苏格拉底预见(VI. 503b7—504a1),在那里,他指出正义城邦里卫士的灵魂必须将灵敏和稳定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苏格拉底和异乡人之间有两点关键性的差异。无论如何,异乡人显示对爱欲没有任何兴趣,反之,苏格拉底则宣称除了爱欲之外,他什么也不懂。爱欲(*eros*)这个词在《治邦者》中只于 307e6 处出现了一次,在那里,异乡人谈到为了和平节制本性的不适宜的欲望。性欲维度的存在,这[3]是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构建美好城邦的关键,在异乡人的划分法里仅仅是间接性地体现在繁殖和放牧牲畜的自然——人类也包括在内——的形式中。

第二点差异与第一点相关;这可能是在教学方式上立即就能发现的一个差异。苏格拉底在他的年轻对话者所做出的选择上是严苛的。他的询问方式不仅风趣和迷人,而且深深植根于对年轻人的性情(*ethos*)和理智的关心,同时也植根于一种对

年轻人的外表和出身名门的暧昧兴趣上。然而，异乡人仅仅要求他的对话者不会引起他的痛苦，并且要温驯听话，或者“服从统治”，要不然，他宁愿唱独角戏（《智术师》217d1—3）。

异乡人比苏格拉底更独断；由于其对爱欲的漠视，他不得不用技术教条的扩散来填补遗留下来的空缺。我们当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即他除了爱欲外一无所知的话，或者仅仅认为他一无所知。《王制》引用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持续展示了苏格拉底对希腊文学传统的细腻把握，还有他在数学和科学上的高深造诣。此外，那篇对话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着正义城邦建设方法和哲人一王教育方式的具体论述。不过，在苏格拉底和异乡人之间还存在着超越性欲兴趣和散漫的趣味性的清晰可辨的区别。在《王制》中，当苏格拉底介绍谈话的最困难的一部分，考察善的相，线喻以及哲学辩证法的本性时，他解释说采取的是适合于年轻人和阿德曼图斯与格劳孔的智力才能的“捷径”（《王制》VI, 504b1—8 和 506c2—507a6）。《智术师》中，异乡人在他分析非存在和各种错误主张时，并没有这种保留。《治邦者》中情况更加复杂，但又一次，尽管异乡人似乎是错了，有时甚至已迷了路，他却从未指出他对真理有所保留，或者对于小苏格拉底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解力来说，只能得到他这样的教诲。

再者，异乡人不仅分享了苏格拉底对划分法的赞美，而且还超过了他，并将这种方法运用于人类事务，然而，苏格拉底只是因其形式结构的清晰性而使用了它，或者提倡使用它（《王制》VI, 510b4—9；《斐德若》265d—266b5；《斐勒布》16c5—17a5）。苏格拉底极力主张划分法并称赞其优点，但是他从没有向我们介绍这一方法在运用范围上扩大的例子。柏拉图著作中仅有的两个例子出现在《智术师》和《治邦者》中的异乡人身上。〔4〕这两个实例，或

者这种事例的设置,是极为模棱两可,在获得其规定目标上仅具有边缘性的影响;再重复一遍,在此它们不仅运用于纯形式上,而且更多地运用于人的类型上。无论其成功与否,这两个事例中对划分法的运用把对话中苏格拉底的作法与异乡人的严格区分开来。

宽泛地讲,异乡人是一个技艺的拥有者,苏格拉底则不是。他提醒我们记住,一个有知识的人是富有学识和明确观念来源的人,并且向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同样的方法详细解释这些观念,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品质。这当然是夸大之辞,但却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而毫不夸张的却是这样的事实,异乡人对政治术的处理在一个问题上造成了明显的模糊性,而这在苏格拉底的教诲中却很清楚,这个问题就是:知(knowing)与作(making)的关系问题。

我们再次期望一点,而这一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将会更全面展开论述。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决不会发现将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 and 制作的这种亚里士多德式三分法。在柏拉图那里,区分总是在以下两方面之间展开:一方面是理论的或认识性的技艺,以算术学和逻辑展示其最大特征,另一方面是实践一制作性的技艺,在《治邦者》中以建筑学作为其范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制作性技艺导致了人工制品的起源,它区别于制作性的活动,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或目的。实践性技艺是一种其活动本身就是自己的结果或目的的行为;例子就是伦理和政治。

由于柏拉图没有区分实践和制作,政治看起来非常像制作性技艺,或者换句话说,城邦以及因此它的公民仿佛是人工制品。而实际上尽管他的对话者谈到了城邦的本性,也谈到了个别人种的不同本性,但是在柏拉图的著作里绝没有规定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在《治邦者》中,城邦里的人为安排基于编织这